

issues in accord with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The future trend will be the integration of "empathetic historiography" and "critical historiography". **Chen Hongmin** thinks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xpression of history is diversified nowadays. Same as 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used for history studies,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historiography tend to become diversified. Therefore if we are asking "what is the best historiography", we could only put our focus on different levels and seek for different standards. **Emily M. Hill** believes that the best historiography is created from excellent historians, regardless whether it is a piece of work or a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contrast, these historians share a common feature: they are very careful in writing, reading and teaching. One more key element is their personal interest; their enthusiasm for working in history as well as the fun and satisfaction brought from various practical activities motivate them to move forward in their creative works, which are full of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spirit, and enable them to keep creating brand new academic areas. **Pan Guangzhe** thinks that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Jiang Tingfu hoped that history could bring the "Glow of Knowledge" to the public, which w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best historiography" if it was lighted up. However, in the stage of histor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standard pole for measuring which questions worth asking, nor there are standard answers for interpreting their meanings; all of them are the outcomes chosen by the historians. Since historians are regulated by numerous realistic spirits/material conditions, the "Glow of Knowledge" is of no doubt a lofty ideality. However, in view of the article by Jiang Tingfu in 1931 in which he praised Qi Shan while disparaged Lin Zexu with the anti-Britain era, his ideality is only a "noble dream".

**Keywords:** historiography, the best, standard, levels, diversity

## 後現代史學在“最好的歷史學”中的角色

古偉瀛

(臺灣大學 歷史系，中國 臺北 10617)



自從歷史學由科學化轉向多樣化之後，在後現代史學的影響下，西歐中心論的“大寫歷史”被否定，“微觀史”、“日常史”和“新文化史”等流派產生，並成為目前研究的潮流。<sup>①</sup>針對一些學者認為後現代造成的衝擊會讓歷史學絕處逢生、終結危機，筆者試圖透過對後現代觀點的歸納和反思，探討後現代有可能對中國歷史學界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和影響，以及是否有可能讓歷史學更趨近於理想？

### 一、後現代史學在中國大陸研究的不足及困惑

從20世紀90年代起，後現代史學帶來的挑戰逐漸在華人學術界受到重視。<sup>②</sup>在大陸學術界則是從1998年左右引入，到2004年達到討論的高峰。<sup>③</sup>儘管後現代歷史學異軍突起，蔚為風潮，但研究方面的局限及內部的複雜性，還是在華人學術界引發了許多批評和困惑。張光華歸納出後現代史學研究的四方面不足：（一）解釋說明多，引申發揮少；（二）對後現代史學做出系統梳理的著作較少；（三）理論較少運用於實際；（四）學術泡沫化：後現代詞彙頻繁使用，“多少帶有炒作和虛張聲勢的意味”。<sup>④</sup>其實，所有的西方史學理論傳到中國來都可能有這些“不足”，這不祇是後現代史學的問題。但具體而言，許多討論後現代的學者，

①② 古偉瀛、王晴佳：《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第200—201、343頁。

③ 張光華：“大陸學界‘後現代與歷史學’研究述評”，《蘭州學刊》3（2008）：118。

④ 張光華：“大陸學界‘後現代與歷史學’研究述評”，《蘭州學刊》3（2008）：120；俞金堯，“令人困惑的後現代”，《學術研究》11（2004）：11。

認為其理論缺乏宏大叙事，將會導致史學碎片化、微觀化、原子化，無法達到史學鑒戒以及尋找認同、追求意義的功能。語言學方法固然有利於深化理解，但若是淪為語言決定論，將導向史學虛無化。

針對語言導致的問題，韓震、董立河在《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提出他們心目中的解決之道：

說後現代主義歷史哲學是胡說，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它確實擊中了現代歷史編纂學的要害，即它忽視了自己活動的主觀性，使歷史認識處在新的樸素層次上。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超越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綜合性視野，接過後現代主義歷史哲學的主觀性原則，將其納入更高層次的理解系統之中，使主觀性原則成為服務於新的客觀性原則的要素。<sup>①</sup>

對後現代史學要“批判性地揚棄”，這“揚棄”顯然是比較負面的一種看法。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早已能够說明歷史學的客觀存在，因此不會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

歷史實在的確存在一些客觀的規律和模式，通過歷史學家或哲學家積極的探索和研究，它們完全可以被相對真實地揭示出來，馬克思關於歷史的思想就是典型的例證。……馬克思主義把實踐概念引入歷史認識，從而在實踐的基礎上將歷史認識的主觀性和客觀性辯證地統一起來。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學本身的意識形態性是一種客觀存在，否認這一點就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表現。<sup>②</sup>

強調能將主客觀結合的實踐史學，這是一些大陸學者的看法。但歷史學畢竟最終以敘述呈現，而此未能解釋或討論語言客觀性問題，仍未能與後現代史學進行對話。

中國人民大學的楊念群教授，曾就後現代進入中國史學界的問題做過細緻觀察。他在2003年就指出中國學者將後現代與薩義德(E. W. Said, 1935—2003, 也譯作“薩依德”)的“東方主義”相參照所暴露出的缺陷：

“東方主義”恰恰強調的是在跨民族—國家狀態下的互動，這種理論路向當然有其重大意義，但當它被移植到中國後，除了給中國學者獲得了得以昂首進入“後現代”理論殿堂的通行證，因而終於找到了一個重新充當批判型知識人的自我角色認同的機會之外，還給中國的“後現代”提倡者提供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即當他們津津樂道於批判西方如何歪曲中國的形象時，其實他們恰恰忽略了如何從中國內部的角度，反思和批判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給中國內部變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後果，從思想根基、經濟互動、社會變遷與政治劇變的多層次梳理中國近代以來如何從傳統社會形態向資本主義形式過渡的歷史遺產。<sup>③</sup>事實上，“東方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兩者大異其趣。<sup>④</sup>東方主義將“東方”加以“本質化”、“刻板化”，而後現代主義則主張存在先於本質。前者在進行宏大敘事，後者則反對宏大敘事；前者相信歷史真實的存在，纔能提出東方與西方相參照的理論，後者則不相信（被記錄下的）真相存在的可能；前者相對支持民族獨立和自覺，後者則認為民族是被“建構”出來的。<sup>⑤</sup>兩個看似背道而馳的觀點，不少中國“後現代”論者透過自身對中西方現代性的思考路徑，將兩者結合起來：

<sup>①</sup> 韓震、董立河：《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sup>②</sup> 蔣重躍：“回應挑戰 啟迪深思：《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後現代歷史哲學研究》讀後”，《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2008）：72—76。

<sup>③</sup> 楊念群：“‘後現代’思潮在中國——兼論其與20世紀90年代各種思潮的複雜關係”，《開放時代》3（2003）：7。

<sup>④</sup> Swanson, Herbert R. “Said’s Orientalism and the Stud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3 (July 2004): 107—112.

<sup>⑤</sup> [美]愛德華·薩依德(E. W. Said):《東方主義》（臺北：立緒出版社，1999），王志弘、王淑燕、莊雅仲等譯。關於民族的“建構”（後現代思潮）或是“自覺和自在”形成（回應後現代挑戰）的討論，參見楊念群：“‘危機意識’的形成與中國現代歷史觀念的變遷”，《史苑》（中華文史網）13（2006）。

中國的“後現代”論者由於一開始把注意力過度集中在如何辨析西方對中國形象的塑造上，力求由此說明中國現代社會的產生是現代資本主義全球框架塑造的結果，這很容易把自身的思考路徑局限於一種外在的民族主義形式的對抗性姿態的表述上，而忽視了對真正中國傳統在制度具體運作形式中所起作用的探查。<sup>①</sup>

事實上，後現代主義的主要內容之一是要去中心化，很自然地，受到後現代主義影響的華人很容易會熱情地擁抱東方主義。然而，若祇聚焦於西方影響論，強調中國民族主義對抗西方資本主義，就不能發掘後現代學說的真正價值。受到在美國的中國學者影響，社會史的“人類學轉向”造就中國社會史、地方史研究的興起。<sup>②</sup>重視“文化”的作用，亦可視為是後現代思潮影響之一。然也要注意，因為後現代的“反現代”立場，也帶來敘事上過猶不及的流弊：

“後現代”敘事也往往容易忽略對基層“文化”傳統進行有力塑造的現代化過程作為支配性因素所造成影響的分析（包括政治與社會的諸多複雜因素的作用），因為刻意強調對現代化後果的抵抗意義，所以較容易過度強調了“文化”作為維繫社會運行的穩定性作用。<sup>③</sup>

楊氏在2009年發表《中國歷史學如何回應時代思潮》一文，也指出在中國流行的“後現代”與民族主義、回歸傳統結合的吊詭：

中國史學界打着“後現代”旗號的一些作品往往變成了對前現代的一種“懷舊”和景仰。也就是說，“後現代”變成了“前現代”的同義詞，或者說在中國史學界，“後現代”碎片化歷史的策略變成了無原則地肯定“前現代”歷史價值和行為方式的一種態度表達。從某種意義上說，史學界“後現代”探索的這種取向無意中與“國學熱”對傳統文化無原則的極度弘揚相互配合了起來，從而使現代的歷史觀表面上擁有反現代敘事的特徵，卻因一味倡導走回“舊社會”老路而跑向另一個極端。我認為這也是缺乏批判能力的表現。<sup>④</sup>

因此，他對“後現代”在華的反省意義提出根本的質疑：

就中國目前的思想狀況而言，我們很難在與現代性問題相對立的哲學層次上定位“後現代”思潮。在中國思想界，“後現代”主張首先意味着是一種重新確認自身位置的知識態度，這種態度由於獲取了某種“民族主義”的時代包裝，和標示出了要為民衆代言的底層立場，在表現上似乎與20世紀80年代有關現代性的普遍主義有所區別。但這種姿態由於沒有真正區分民衆在傳統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現代民族國家所賦予的“民族身份”之間的差異性，又由於其對市場機制的滲透採取了欲拒還迎的曖昧態度，所以其所謂反思的有效性是十分令人生疑的。<sup>⑤</sup>

認為中國學者所提倡的“後現代”，往往祇是民族主義的時尚化，以及名義上的底層化，並沒有達到哲學反思標準。楊氏認為，如果要解決當今中國史學的這個問題，應該要從一些共通的“中層要素”着手，防止後現代思潮影響帶來的史學“碎片化傾向”。<sup>⑥</sup>

從以上討論可知，若要正視“後現代”對中國史學的影響和價值，不能照搬20世紀中國近代史的“衝擊—反應”模式，而是要對照中國傳統史學，來尋找後現代史學在中國的未來出路。

## 二、後現代主義與中國傳統史學

傳統中國最早的“良史”標準，在於“直書”。《左傳》宣公二年（前607）載：

<sup>①③⑤</sup> 楊念群：“‘後現代’思潮在中國——兼論其與20世紀90年代各種思潮的複雜關係”，《開放時代》3（2003）：19—20、25、27。

<sup>②</sup> 楊念群：“‘在地化’研究的得失與中國社會史發展的前景”，《天津社會科學》1（2007）：115、129。

<sup>④</sup> 楊念群：“中國歷史學如何回應時代思潮1978—2008”，《天津社會科學》1（2009）：129。

<sup>⑥</sup> 楊念群：“‘新典範’和‘舊史學’的衝突與調適——對中國現當代史學變革的一個貫通性解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6（2012）：114—115。

乙丑，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sup>①</sup>

班固（32—92）著《漢書》，於《司馬遷傳》之“贊”中亦言：

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sup>②</sup>

“其文直，其事核”的“實錄”風格，表現史家自始至終對於真實的追求。這是良史的兩種定義，但可以有不同風格的。例如，《後漢書·班彪傳》中范曄（398—445）又對司馬遷（前145—前90）與班固進行了比較：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材。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sup>③</sup>

不論是強調直書或敘事詳明，中國傳統早期的良史的標準都是相當簡單而原則性的。然而，世易時移，祇是秉筆直書，善惡不隱，無法產生說服力。唐代以後，開始注重會通；清代以來，重視寓褒貶於事實，章學誠（1738—1801）更提出重視“史德”的看法；在意識形態及利祿誘惑牽動史家“氣”與“情”的今日，“史德”更顯重要。<sup>④</sup>

直言不隱、生死以之的傳統良史標準固然令人心嚮往之，但若更進一步採取後現代觀點，以“後之視古”，更會感到清代學者乃至現代學者的批評精神還是不够的。傳統中國有許多值得再檢視的論述，尤其權力籠罩下產生的既定中心價值觀——例如，過度的孝順被視為重宗族家庭而犧牲個人；又如，重男輕女、忠君愛國、華夷之別、重視科舉等等，表現了對朝廷及意識形態的屈從。這些都是古代知識體系氛圍中的產物，可以在寫史時重新討論和審慎看待。於是，中國傳統的理想史學和後現代史學產生出一種戲劇性的對照。

### 三、後現代史學在未來中國的出路

雖然後現代主義在中國應用時能够抵抗西方中心主義、超越現代化敘事，特別是在反對民族主義論述上呈現很強的生命力，但如何處理革命史敘事及一些意識形態問題，與如何加以應用、動員中國傳統提供的資源，尚有努力的空間。語言學的轉折是後現代的一大特點，但在華人世界，由於中文的象形特色以及史權的長遠影響，在語言理論上的衝擊及應用尚未充分展開。後現代有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學就是“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或許是未來史學撰述時可利用的一種方法。

英國的“後現代”史家索思蓋特（B. C. Southgate）曾提出後現代史學著作的三大最重要特色——“自我反思”（self-reflexivity）、“語言敏銳”（linguistic awareness）、“容許模



司馬遷畫像

班固畫像

① 《十三經註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清〕阮元校，第6冊，第365頁。

②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7，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738頁。

③ 〔劉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7，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386頁。

④ 古偉瀛：“撰史憑誰定良窳？——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臺大歷史學報》44（2009）：1—41。

糊”(tolerance of ambiguity),<sup>①</sup>認為後現代對於史學的意義就是它的“自我反思”特性：

自我反思性是作品的核心，透過全書告訴吾人歷史是有意以“意識到自己是一加工品出現的……含義多重且是開放式的結局”。因此，自我反思式的史家不但不會像一般史家所主張的，與其著作保持距離，反而會不時介入其寫作中，鼓勵讀者意識到其間的問題及所採取的設計。<sup>②</sup>

他們能够反省各時代史家的解釋，對詞彙的定義和形塑，都與自身觀點及所處的社會背景、語言甚至情緒產生關係。<sup>③</sup>理解這些差異，就更能避免自以為是的“中立”、“客觀”。即使是描寫記錄戰爭或傷痕的過去，也不以居高臨下的態勢或倨傲的言語來面對爭端，而是重新用敏銳的眼光檢視其不確定性，廣泛採用各種不同觀點的資料提供可能的解釋。因此，用後現代看歷史學在西方的前景，反而能與傳統相結合，而且充滿希望，因為過去對未來是如此的重要，<sup>④</sup>正如哈魯圖尼恩(H. Harootunian)所言：

在現代性所引發的衝擊中，所有的集體記憶、所有“主動的回憶”都是用來保護個體，免於受到震懾。藉由將事件撰成歷史，往往可以達成磨平棱角、舒緩突兀，並使過去的變遷看來像是自然發展的結果<sup>⑤</sup>

後現代能幫助歷史研究從各種觀點切入，療傷止痛，打造較好的未來。充分反省、重視多元的歷史，與現在的社會血脈相通，也因此有了溫度，有了魂魄。

此外，由於後現代的顛覆性及破壞性，不承認絕對的客觀及真相，打破現代性的某些封閉論述，常能維持開放的立場，因此有了與過去割裂的契機。美國的“新實用主義”(New Pragmatism)者，也是後現代的代表人物里查德·羅蒂(R. Rorty, 1931—2007)就主張，歷史研究應該讓人產生對未來的希望。<sup>⑥</sup>這聽起來好像宣傳家一樣。與歷史的傳統、清末以來的史家期望能中立地讓史料說話有點不同，羅氏認為這是歷史在未來的出路。然而，若採取完全開放的立場，則將沒完沒了，言人人殊，各是其是，無法形成讓人能够理解的論述。我還是主張應該“暫時的封閉”，限定範圍，加以整理。但如何從一團混亂中建構歷史秩序？索思蓋特提供了他的見解：

“如何和從哪開始？”祇是一個起頭（開場白），提醒着我們，任何有意義的論述——秩序井然有條有理的起承轉合——都是由史學家在所研究的題目上強行安排加入的，而且是在事件之後纔安排的。生活本身（從吾人經驗所知）往往是無有具體輪廓形狀的，“由一系列不相連貫的情節組成，並沒有明顯的動力引向故事高潮，而且作者也隨時準備承認他故事主角所生活的世界裏，當時的事情並非一件件很有秩序地發生”。祇有在回顧時，吾人的記憶努力去造出一個“流暢的敘述”強加在事件之上的，其方式是很方便地忘記那些構成實際生活缺陷的干擾、問題和衝突。<sup>⑦</sup>

為了便於說明和敘述，歷史書寫並非過去本身，而是在事件發生之後，敘事者化約記憶，除去冗蕪，發揮想象，佈置情節，最後留下來的部分。即使有些重組和忘卻是無意識產生的，或是受到語言特質的限制而轉化，但這一“流暢論述”的寫作過程，與中國傳統史學家“尚簡”的看法<sup>⑧</sup>，仍能互相呼應。

伊格爾斯(G. G. Iggers)和王晴佳在近年出版的史學理論著作中，提到史學經過後現代挑

<sup>①②③④⑦</sup> Beverley Southgate, *What is History fo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54, 159, 155, 160, 173—174, 155.

<sup>⑤</sup> Harry Harootunian, *History's Disquiet: Mod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18—19

<sup>⑥</sup> Richard Rorty, *Achieving our country :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9—140.

<sup>⑧</sup> 章益國：“論傳統史學的‘尚簡’”，《史學理論研究》2 (2001)：20—23。

戰以後發展的大趨勢：（一）文化與語言的轉向；（二）性別及婦女史；（三）歷史與社會科學的新結盟；（四）不再強調國族主義；（五）世界史及全球史的書寫。<sup>①</sup>這些觀察已超越後現代史學的影響，因為後現代史學是很反對宏大敘事的，而未來趨勢卻是要走向“全球史”（global history），這也勢必影響未來的中國史學。

“全球史”是將各個地方有機地聯結的一種歷史，是史家在當代不可避免、必然會遇到的問題。雖有所扞格，但如何將後現代的啟示融入全球史的論述之中，應該是吾人應當注意的課題。當然，去中心化、反一元論以及時時警覺自己的論證背後的權力關係是矯正當代史學流弊頗好的良藥。無論是世界史還是全球史，在各層面上都應該對等、溝通、交流，像哥特式大教堂中的玫瑰花窗那樣，各地區均如花瓣，展現不同色澤形貌，但都同等重要，同構一幅均衡完美、瑰麗多彩的花樣。<sup>②</sup>

至於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依筆者之見，最好的歷史學應該注意質性研究與量化統計並重；同時探索個人動機並進行心理分析，將理性與潛意識的作用共同考量。這些想法雖然會受到較激烈的後現代學家的質疑，認為不過是幻想，但是有不少史學的較小的議題可以透過上述方法加以解決。對於後現代，我們不是要“批判性地揚棄”，而是應“批判性地繼承”、“創造性地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堅持歷史書寫可以“近真”（approaching the truth）的信念，達到多數可接受的“開放性真相”。就算隨時準備修正結論，也必須以“暫時性的真實”來面對生活以及準備更美好的未來。

[古偉瀛（1949—），男，生於中國臺北市，1983年獲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1994—1997年任臺灣大學歷史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現為臺灣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天主教會史和史學方法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清季的立憲運動——處理變局的最後抉擇》、《臺灣天主教史研究論集》、《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與王晴佳合著）等。]

## 走向“共感”與“批評”相融合的新歷史學

[韓國]白永瑞

（延世大學 歷史系，韓國 首爾）



想給“好的歷史學”下一個約定俗成的定義是不太可能的，但它在學者之間也並非沒有一些共識。從以“公共性”（publicness）為媒介的歷史學來說，“好的歷史學”應當是歷史學家進入其所處的社會現實中（即入世），在努力生產和普及與社會現實相關的歷史知識的同時，不斷反思他所提出的實用性是否與公眾所關心的問題相符。更具體一點說，“好的歷史學”是在按照“學術規範”（discipline）將社會議題轉化成學術議題的過程中得以實現的。在此，我想探討一

<sup>①</sup> Georg G. Iggers, Q. Edward Wang,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Harlow, England ;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8).  
[美]伊格爾斯、王晴佳：《全球史學史：從18世紀至當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楊豫譯，第410—417頁。

<sup>②</sup> 哥特式大教堂玫瑰花窗的譬喻，參見黃家城：《中國人的心靈與基督宗教》（臺北：光啓文化事業，2013，原著1957年出版），第82頁。